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雏鹰文库—学生成长百卷读本(58)希望工程



雏鹰文库——学生成长百卷读本
希望工程

让孩子长大

北京溪水河小学四年级学生雯雯从学校拿回了上学期获得的“三好学生”和“作文一等奖”的奖状。她没有像以往那样“欢呼”，只是静静地把它放在了一边。她觉得，和春节的闽西之行装进她心里的事相比，这已经算不了什么。

看着自家桌上丰盛的饭菜，韩阳想起了闽西贫困户的那顿年夜饭，他对妈妈说：“闽西那儿为什么穷？因为没有路。”这话出自13岁的宝贝儿子口中，着实让当妈的吃了一惊。就是在去闽西的路上，韩阳先是丢了登机牌，又把价值3万多的相机忘在了安检口。

坐在返京的飞机上，日坛中学高二学生曹一楠一直不快活。虽然他又将是这个大都市的孩子，回到了繁华之中，但此时的他已不是彼时的他，他忘不了采访过和没有采访过的生活在贫困中的老区人民，想到他们还将在红土地上度过童年甚至一生，他心中沉甸甸的。

回到家中，杨吟足足睡了一天一夜。在闽西的最后几天，她太累了，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她忙着写稿，急于把所见所闻传递出去，她觉得这是一种责任。起来，又赶着做一件事，给长汀的赖老师写信，实现自己的承诺，参加他们救助特困的行列。她又从自己每月六、七十元的零花钱中拿出50元，帮助一个女孩子，这样自己穿小的衣服也可以匀给她穿。……从闽西回来，百名首都小记者扶贫采访团的孩子们想着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做着自己认为最该做的事情。他们的父母发现，几天之内，自己的孩子突然长大了。他们懂得关心别人，变得不那么容易满足，感到接受父母过份的呵护是难堪的，开始考虑自己的责任。这使家长开始思考，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就在10天前，载着刚从北京来的18名小记者的汽车行驶在厦门的马路上，忽然，车内不知是谁高叫起来：“麦当劳！”随即，车内一片欢呼。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孩子熟悉的只有这“麦当劳”。应该说，此时的他们，身后带着一个影子：都市生活的印记。尽管此次活动的主办者，在出发前对孩子进行了集训，对于贫困和此行的艰苦作了详尽的描述；尽管孩子的父母们都喋喋不休地讲述过自己经历的苦难和挫折，但这些都让孩子们身上产生的冲击，远没有主办者希望的那样强烈。在孩子们的心中，贫穷和苦难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孩子们对这个概念有着各自的理解。

闽西之行中，带队的老师没有再去反复描绘贫困的残酷，也没有再去强调孩子们应该去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可孩子们却自己给贫困做出了定义，明白了自己该做什么。这是因为，孩子们用自己的身心体验了这一切。这体验在孩子们的求知过程中是何等的重要和有价值！我是个家长，也曾是个知青，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也把自己对艰苦的体验当作一种财富，希望它成为我的孩子成长中的一份营养。当孩子只是把它们当成一个故事来听，产生恍如隔世的感觉，我不解甚至气愤。我想，我们这一代，也生活在新社会，可我们为什么对上代经历的苦难就那么容易理解而不这么隔膜？我们在以往好起来的生活中可以毫无抵触地接受艰苦奋斗的教育，而不认为：时代不同了，这是老皇历。或许，这是因为在我们的童年，苦难和贫穷离我们尚不远，艰苦本身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即使是对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来说。或许，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我们的父母把真实真实的生活交给了我们去体验，而没有像今天的我们，这些在都市里做独生子女父母的成人，把经过包装的生

活端给我们的孩子。这就是说，一家的长者都有这样的事实，一家的长者都有这样的心愿：苦谁不能苦孩子。做父母的、父母的父母舍不得用几乎相当一个人一天的工资去吃“麦当劳”，可孩子可以尽情地享用；做父母的觉得自己已经吃过苦，而我们的孩子决不让他再受一点委屈。夏天，蚊子还没飞近，父母已为孩子消除了隐患；冬天，冰雪天，孩子不必受挤车之苦，打车送他上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们的生活原本如此吗？在克服困难的体验被如此剥夺之后，我们的孩子会不会退化？他们还会懂得什么是困难、艰苦、贫穷？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一位母亲表述过这样一种心情：“我18岁时去插队，艰苦生活的磨炼使我终身受用，但我丧失了学习的机会。我总想我失去的不能让孩子再失去，却没有想到，体验是不能由别人来替代的。”像这位母亲一样，我们也开始明白，剥夺了孩子的体验，也就是剥夺了孩子获得真知的渠道和机会，我们在做傻事！

孩子们从闽西回来，失学而渴望读书的女童和危旧的泥屋告诉他们不必向历史去寻找贫困，也不必向未来寻找责任。在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贫困与责任同在。中学生曹一楠带回来的收获已不再幼稚，他说：“本世纪末，如果我们的国家还有8000万人口没有摆脱贫困，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就不是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从完全意义上进入了21世纪。闽西之行使我第一次真真实实、全全面面看到了自己的祖国，使我找到了人生的坐标，使我有了强烈的责任感。扶贫这件事，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可以办的，不管我今后做什么，我都会时时刻刻把老区人民装在心里，想到全中国人中还有兄弟在受苦，有困难，还需要帮助。”

闽西之行，让我们看见了我们的同胞还有好多处在贫困之中，还有好多不能像我们一样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

那些贫困的兄弟姐妹也有权与我们一起生活在阳光之下，有权享受党的温暖，他们也要与我们一同长大，将来也要成为建设祖国的主力军。

同是中国的希望，中国在呼唤着希望。

充满希望的工程

希望是几尽绝望的生命的呼喊；

希望是美丽的梦；

希望是人间崇高的爱。

大别山深处，一个为挣学费去砍柴的孩子，不幸落入狼口；一个贫困的流浪儿冻死时手中还紧握着一本语文书，犹如安徒生笔下卖火柴的女孩死后仍握着一把燃尽了的火柴……

河北省的桃木疙瘩村，一个老师只对着两个学生讲课，其余的学生都因贫困失学了。这个古老的以桃花而以桃木疙瘩命名的村落中最高学历者只是两个三年级小学生，该村距北京仅 180 公里；而此时电脑已走进一些北京人的家庭。

这绝不是绝无仅有的例子。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因贫困失学者 100 万，6—14 岁失学者 300 万，占同龄人的 19% 还多。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中国也是一个文盲大国，全世界每 4 个文盲中，就有 1 个中国人。

1991 年 2 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19 名师生在全国 113 个贫困县考察，这些生活在城里的人耳闻目睹了令他们难以相信的事实：

大别山深处，李先念曾转战过的将军村。一位校长指着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妇人对来考察的师生说：“这老婆子命苦啊，40 岁才得个儿子，男人死得早。那年秋天，10 岁的孩子为了挣学费，瞒着他妈独自到深山里打柴。天黑了，还没回来。村长担心孩子被狼吃了，带着全村人满山去找，最后在一滩血迹中找到孩子的几根骨头和一只血肉模糊的小手。老妇人扔下火把，撕心裂肺地喊：‘我的儿啊我的儿。……’便昏了过去。”

在太湖县台云乡，村长带着师生去看一位失去了父母和弟弟，孤身一人四处要饭的失学儿童叶方和。推开他家屋门，空无一人。村长吆喝围观的孩子找。好一会儿有个小孩跑来说：“方和哥在菜地里睡着了，我怎么拉，他也不起来。”村长他们急急地赶到菜地里，12 岁的小方和已四肢冰凉地蜷缩在油菜地里，一只要饭的碗扣在他头上，手里还紧握着一本小学二年级语文书。人们想从他手里抽那本书，可怎么抽也抽不动。这情景使人联想到安徒生笔下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临死时手里握着烧过了的火柴。

上学——这是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几尽绝望的生命的呼喊。

上学——这是改变他们命运的美丽的梦，但贫困无情地剥夺了他们的梦。

一个教师走几十里山路，去动员流失学生走向教室。然而，这都是些生活都没有保障的孩子啊。老师大哭不已，但她能感动谁呢？

首先承担起扼制贫困地区学生流失责任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老师。

湖北省罗田县落梅河乡的教师，每年开学前都要走门串户地去动员失学生上学。那年 2 月，教师赵建成在寒风中走了 30 多里山路，敲开了学生江杏春的家门。江父开门时呆住了，门外的赵老师外衣透湿，帽檐上渗出的汗珠结着冰，寒风中抖着身子哆嗦着说：“就一句话，让孩子回去。”汪父哽住了，半晌，突然说：“去，要去，讨米也让他去。”

教师张碧云走访学生江峰家时，看见江父患病在床上呻吟，江母在煮野菜。见到老师，江峰拿出皱皱巴巴的作业本，泪汪汪地说：“老师，寒假作业我做了 3 遍，可……可没法再上学，交给老师改了。”张碧云接过作业本，

心潮起伏。她苦苦求江父母开恩让孩子上学，但磨了几个小时，江父母还是不答应。她急了，说：“峰峰在班里是数学尖子，不读书可惜啊……”说着，她大哭不已。哭得江峰可怜巴巴地望着老师：“老师，我家穷，别难为我爸了，作业您帮我改就行了。”张碧云一把搂过小江峰，哽咽着说：“峰峰，别难过，没学费我出，没吃的我给，跟我上学去，好吗？”

面对这样的教师，这样的情景，天地亦为之动容。

大别山区桐山乡有一名叫胡忠的3年级学生，父亲在城里拉人力车被汽车轧死了。那年暑假，他天天去打柴，开学时，他背了一包卖柴换得的硬币来交书杂费，可数来数去，还差8角9分钱，他怕学校不让他上学，哇的一声哭起来。老师也哭了，一把拉住小胡忠的手说：“你来上学就是了，别的什么也别管。”

在贫困地区，教师常常不能如期领到工资，但他们又常常为支持贫困失学的儿童上学而垫付书杂费等。湖北罗田县落梅河乡的教师几年来为学生垫付了8万元，占他们收入的一半。其中一位叫朱冬明的教师工作8年，收入8000元，为学生垫付了近6000元。四川一位教师在一年春节来临前给上级反映：要过年了，可我们已有3个月没领到工资了，但我们几乎每个人又都为学生垫付了200元。200元还不够城里一些“大款”逛趟舞厅的钱，但对年人均收入200元的贫困地区来说，200元就是一年的饭啊。

都说，教师好似蜡烛，贫困地区的教师是一根蜡烛两头点，他们自身既要面对物质的窘困，同时又为良知和责任驱使，为找回大量的失学生，超限度地支付着物质和非物质资料。最令他们痛心的是，在还没有看到“桃李满天下”的气象时，却目睹了好学生半路夭折的惨景。

共青团首倡“希望工程”，神州涌动爱潮，中共中央6位政治局常委纷纷解囊，一位为中国改革奔走南方的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为“希望工程”捐款3000元。

国家《义务教育法》第四条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在贫困地区：

——家庭，因贫困而无法支持孩子上学；

——学校，教师的奉献也达到了极限；

——国家，1977年至1987年教育经费的年均增长为16.9%，高于同期国民收入年增长14%和财政支出年增长11.3%的幅度。我国还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国家对于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也已尽其所能了。

——那么，社会在教育方面能做些什么呢？

多少年来，中国的社会功能仿佛在沉睡，人们习惯了政府管经济，办工厂；政府管卫生，办医院；政府管文化、养文艺团体；政府办教育，办学校。总之，政府包办一切，人民政府背着大而沉重的包袱。

1989年春，当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时，几名干部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青少年的教育事业。经过一番广泛的考察，慎重的研究后，他们提出了“希望工程”计划。

希望工程——旨在集社会之力，动员民间团体和民众的财力资源，支持贫困地区教育，是一项为政府排忧，为社会解难的社会公益工程。

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上出现了这样的广告：……一名品学兼优的12岁的女生卿远香失学了，她在最后一次期末考试时，在考卷末尾，

她含泪写上了4个字“我想上学”。在大巴山区有个小姑娘叫王翠华，父母让她退学，她哭着不依，母亲说：“又要读书，又要吃饭，哪有钱啊！”小翠华跪在妈妈面前哭着说：“只要让我上学，我不吃午饭了。”此后，每天中午小翠华都独自躲在校后的山坡上，饿着肚子望着天空出神，每天中午对她来说都显得格外漫长……

一石激起千层浪，“希望工程”唤起了中国人的良知和责任。在“希望工程”宣布建立1周后，就收到1.8万元人民币的捐款。在80年代的最后一个月，共青团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所有的到会者都为“希望工程”捐了款。

在边界图门市的邮电局，营业员接过一张汇款单，收款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映入营业员的眼帘，她又把目光扫向汇款附言：“基金会的同志，钱不多，但这是连队全体官兵的心，愿所有的孩子都拥有美好和幸福的明天。”一会儿，女营业员感动得站了起来，向汇款的青年军官深深地鞠了一躬：“同志，先让我代表那些小孩子谢谢你们！”

那年6月，一位盲人马卫东，凭着一根木棍和一颗爱心，换乘三次车，从北京的香山赶到东城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他的行动感动了在现场捐款的许多同志。

同龄人的命运牵动着同龄人的心，1990年4月，“希望工程”推出“城乡小伙伴手拉手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的活动，全国数百万少年儿童参加了此项活动，1200个城市与贫困地区结为联谊伙伴。

1991年，“希望工程”收到捐款100万元；

1992年，截止到8月底，“希望工程”收到捐款400多万元。

这是一个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数额。

“希望工程”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关心和支持。

中共中央的6位政治局常委为“希望工程”捐款。

已故共和国主席杨尚昆为“希望工程”捐款500元，并于1992年“六一”前夕在中央电视台就“希望工程”发表讲话。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在接受了台湾龙祥影业公司董事长王应祥请他转交“希望工程”的4万美元捐款后，两次打电话询问此款落实的情况。

已故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最先为“希望工程”题词。

邓颖超同志在弥留之际，委托工作人员给“希望工程”送来了1000元。

徐向前元帅在逝世前不久为“希望工程”留下绝笔——“金寨县希望小学”。

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向“希望工程”捐款2000元。

令“希望工程”处的工作人员最难忘的是，1992年6月的一天，两位军人来到他们的办公地点，送来3000元，问捐款者姓名，答曰：“捐款人不让透露。”填写捐款证书时，军人说：“就写一位老共产党员吧。”军人出门后，工作人员也悄悄跟了出去。见他们走出胡同口，又拐出一段路才上了停在那儿的小车。工作人员记下车号，后悄悄地从有关部门证实，这位捐款人就是80岁高龄仍为中国的改革而奔走大江南北的老共产党人——我们的邓爷爷。

海外回响希望之声，凌峰翻车大山中，却感慨流失的学生像是古老黄河流失的泥沙，每一块泥沙都可能长出参天大树。

那年4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推出“希望工程——百万爱心活动”，在海外亦产生强烈反响。

1992年4月，香港富进戴投资有限公司捐款10万元港币，香港鹏利控股有限公司要求资助建2所“希望小学”，随后汇款40万元人民币。

5月台湾星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俊文先生捐款20万元人民币。

6月，台湾信谊基金会同仁捐助8010美元，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会长南怀谨先生捐款50万美元，台湾艺人凤飞飞女士捐款60万元人民币。

1992年，香港演艺界、明报、商业电台、工联、教联在香港设点为“希望工程”集资达300万元港币，澳门青商会教联会为“希望工程”集资达800万元港币。

台湾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凌峰先生首倡的“希望工程”全国巡回义演于1991年10月25日在山东济南拉开帷幕，至今已义演40余场，募捐人民币250万元，建希望小学8所。

这是凌峰在兰州主持义演时的情景：……伴着“三百六十五里路”的歌声，凌峰从观众中走上舞台，一曲歌完，凌峰对大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甘肃康乐县有个小姑娘叫马阿西叶，今年才8岁，为挣够每学期20元的学费，她每天到砖窑去背砖，而她背1000块砖才挣8角5分钱，小姑娘瘦弱的身躯被沉重的砖压垮了……。此时，凌峰走到台前告诉大家，马阿西叶已来到晚会现场，有了“希望工程”资助，她不用再背砖挣学费了。顷刻间，场上滚过雷鸣般的掌声。

凌峰又介绍了新疆伊宁市的杨绍清女工，她一次就为“希望工程”捐款1万元，而她本人却已身患绝症……伴着凌峰的话音，场上出现了抽泣的声音。

去年在由山东平邑到营县为一所希望小学剪彩的路上，凌峰和怀有4个月身孕的凌太太乘坐的小车翻了，幸而都未受大伤。从车中爬出的凌峰带着伤对随后赶上的摄影记者说：看来在“希望工程”的路上充满艰难险阻，如果人生需要牺牲的话，我将选择这样的牺牲方式。

在目睹了贫困地区学生流失和全国救助流失生的情景后，凌峰动情地说：“流失的孩子就像古老黄河流失的泥沙，是黄土地上流失的希望，每一块泥沙都可能长出参天大树。”

“希望工程”不仅为救助失学生带来了希望，也为共青团工作的发展带来启示和希望，这抑或可以称为“希望工程”之外的希望。

“希望工程”是共青团首倡、全民参与兴学办教的一件实事。当“希望工程”发展至今时，人们开始从理论上总结这一活动的意义：运用民间力量，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共青团找到了参与社会发展，符合团组织特征，发挥团组织能量的一条路了。显然，“希望工程”所以能迅猛地发展，其生命的源泉之一，在于社会民众的支持；其生命发展的后劲，在于共青团成功地探索出了参与社会发展的又一新路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今天看来这是极浅显的真理。社会是检验共青团工作的答案，承认这一点有时略带点痛苦。这几年，共青团在主观上努力为社会和青少年办实事，而10多年来像“希望工程”那样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收到良好效益的实事毕竟屈指可数。因此，再思量原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同志反复强调的团内要反对不正之风，更要反不实之风，更掂出了这话的分量和深意。

共青团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由于年龄要求，团干部任期短，流动快，这既给共青团带来了活力，也给一些团干部产生了错觉，导致了短期行为。

有记者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希望工程’何日可告成功与圆满结束？”徐永光回答：“它的成功与结束之日将在21世纪的某一天，在中国再没有一位因贫困失学的儿童之时。”这长远的目标，使“希望工程”有了明确的任务和长期的计划。

——参与社会发展，为社会和青少年办实事，克服了短期行为。“希望工程”为改革中的共青团和共青团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了并非全新的，但却是富有实际意义的启示和希望。

“希望工程”给中国广大的贫困孩子带来了希望。那么，共青团最初又是怎样发起希望工程的呢？下面，我们看看这位最初发起这项伟大工程的人的一篇报告：

《希望工程让我生命飞扬》。这位伟人就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同志，一个不安分的灵魂，一个挑战的性格，和一个名扬海内外的崇高事业之间的姻缘：

希望工程干了5年了，这是第一篇关于“我与希望工程”的文章。

有人说我在团中央时就不安分，不像个“组织部长”，搞“希望工程”更出人意料，这可能是温州人的性格使然。

温州人性格中最本质的特征是务实和对于新事物的勇于探求，据说这些源于南宋时期浙江的“永嘉学派”。

我是1978年筹备共青团十大时调到团中央工作的，在组织部一干就是10年。

我不习惯欣赏沉浸在已有的成功中，对否定旧的东西也不感到可惜，常有人对我从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到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的转变感兴趣。

前不久我接受北京电视台记者采访，记者向我提问：“你为什么不继续做官，而来办‘希望工程’？”我回答：“做官也好，做公益事业也好，只要为老百姓做事，都是有价值的。我这个人走仕途不得要领。一个做官的徐永光和一个做‘希望工程’的徐永光，我以为后者更适合于我。”

我把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段献给“希望工程”，也许是命运的呼唤。我刚来到人世，父亲就离我而去，母亲靠给人纳袜底养育了我们5个孩子，小时候我们经常饿着肚子读书。现在兄弟姐妹都成人了。哥哥姐姐都是教授级的教师。我想要不是读书，要不是国家给的每学期三、五元的助学金，哪有我们的今天。

还有1986年，我下基层到广西蹲点两个月，在金秀瑶族自治县的金秀乡，了解到一个4000多人的村子，解放以来没出过一名初中生。在广西三江富禄的16个行政村中有8个村找不到一个初中毕业生。金秀乡、富禄乡，都是好听、诱人的地名，然而却是公路不通、照明无电的穷乡僻壤。“金秀”“富禄”，这地名中寄托了几代人的期望，然而却是金秀乡中无秀才，富禄乡里难富禄。

在广西大瑶山中度过的两个月真令我难忘，在以后的生活中——想起那些失学儿童的身影，我胸口就仿佛被那沉重的大瑶山压得喘不过气来。

投身“希望工程”这一崇高事业，令人生命飞扬，创造力如涌泉奔突。如果说这几年工作中有什么得意之作，似乎也可举出几件。

首先当推“希望工程”四个字的命名。当初，大家给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事业取了许多名字：“春雨计划”“育人计划”“桃李计划”，都觉得不尽人意。宣传提纲的清样出来了，还是没有一个中意的名字。一天夜里，

在辗转反侧中，脑子里突然闪现“希望”两字。啊！“希望工程”，多么令人神往的字眼。那时怎么也想不到，这四个字已然成了当今的一种社会时尚。

在“希望工程”的发展中，我们不是固守一种工作模式，而是在不断调整和否定中达到新的突破。

“希望工程”创办之初，我们以信函方式集资。几十万封请求募捐信，都是靠手抄浆贴发出的，真是劳民伤财，费时费力。如何才能提高效率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一天下半夜2点多，我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个念头，为什么不在报刊上做公益广告？假如《人民日报》上做出个广告，不等于就是我们给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读者发出信函了吗？我兴奋得把妻子叫醒，说我想了好主意，这个主意值200万。我妻子睡眼惺忪对我嘟囔：“你有病。”第二天，我把这个主意告诉了大家，一些同志怀疑，“党报怎么会刊登这种广告？”我说：“哪个文件也没规定不能登这种广告啊？在中国有些事并没有规定能干或不能干，而是要我们自己去试去闯。”接着，我自己撰写了广告词：

“……陕西省镇安县贫困地区有一名12岁的女孩卿远香，她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去年父亲病逝，母亲带着她和不足4岁的妹妹过着艰难的生活。她失学了，白天喂猪，砍柴，晚上拿出珍藏的课本自学。期末考试到了，她匆匆干完活，跑到学校，在剩下的半堂课里认真地答完考卷。在考卷末尾，她含泪写下四个字，‘我想上学！’……”

写完后，我派人送到《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很快广告刊登出来，我们的广告打动了无数善良人的心，许多地方的报纸都纷纷转摘这份广告，这大概在中国广告业恢复以后也是仅见的。

广告刊出后，我们收到的捐款额直线上升。

办“希望工程”中的又一得意之作，是以定向资助为导向的筹资机制的建立，使“希望工程”真正成为全民参与的事业。在起初的两年多里，“希望工程”捐款由我们统一分配，对此，我们在报纸上正式声明：“鉴于贫困山区通讯不便，不接受一对一的捐款救助方式，但我们保证把捐款全部用于救助失学儿童。”这种以我们自己管理能力出发而设置的救助方式，使捐款在云南省使用的情况无法得到直接反馈，影响了群众捐款热情。一天，一封群众的来信放到了我的案头。来信说：“作为一名热情支持‘希望工程’的人，总觉得仅仅捐款不够，希望能与受助孩子保持联系，看到孩子的成长，使自己有一种荣誉感和成就感。”捐款人情真意切的话使我感动和茅塞顿开。虽然当时我们的声明刚刚见报，我还是通知救助管理部门重新审视我们的观点，拿出一对一救助的新方案。经过一段紧张的调研准备工作，1992年4月15日，我们推出“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号召结对救助失学儿童。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小平、江泽民、李鹏同志为“希望工程”的题词。这一年救助失学儿童的规模也由前一年的4万人猛增至32万人。

但是，成功的背后又潜藏着隐患，由于结对捐款者的大量增加，使我们的工作量大增。有人统计过，从接受捐款到捐受双方建立联系，完成一名失学儿童的救助，需要经过20多道工作程序。这意味着1992年我们的救助工作需要完成7百万道工作程序。在我们最忙的时候，当时与我们为邻的警卫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部队指战员都来帮忙了。即使这样还是忙不过来。于是有人担心，“希望工程”的容量是否已到了极限！这时，我想，人脑不行，为什么就不能用电脑呢？这个提议立即付诸实施。由美国AT&T公司捐赠设

备,由航天部二院研制开发的“希望工程管理信息系统”于1994年投入运行,并在全国大部分省区实现联网。1994年的“希望工程1(家)+1助学行动”在该系统的支持下,救助规模在过去54万人基础上突破了百万人大关。

共青团,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她使我认识了社会和自己,使我走向更广阔的人生。

我从1978年调进团中央机关,至1988年脱离团中央机关工作来到青少年发展基金事业,其间做了10年的专职团干部。是10多年的团中央机关的生活,使我有机会了解农村、学校、工厂等广泛的社会,这对于我今后的生活无疑是一笔重要的财富。是10多年的团中央机关的生活培养了我一种综合、理性思维的能力,使我能从一些零碎、具体的现象中找到理性的结论。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的经历,使我养成了做事规范、注意协调和善于用人之长的习惯。而这些正是我今天能做好“希望工程”的人生经验。而“希望工程”这一令人神驰的事业,又使我追求到了生命的至高幸福,走向更广阔的人生。

不久前,我同1978年同时进入团中央机关的几个老朋友在福州不期而遇,他们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某局局长,中国青年旅行社社长,福建某学院教授。老朋友见面,分外欣喜,举杯之间,感慨系之。那天,我说了这样一段话:“人生的道路很宽,我们4人都有点本事,但不必只在仕途一条道上挤。做官的把官做好,经商的把生意做好,教书的把学问做好,那就各得其所。而我,能把‘希望工程’做好,也此生足矣!”

希望工程荆楚行

几十年前，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用“捧出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句话，来形容那些忘我办教育的民族英杰。

今天，我们的希望工程之路总程近 3000 公里，从春意浓浓的大别山，到春雪初融的神农架，在重重叠叠的大山深处，我们结识了一个又一个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我们看到，在他们身上，这种“捧出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在熠熠闪光，并发扬光大。

去年还欠债 1 千万，却将海外寄给他和他的收养孤儿的 24.5 万元捐款，全部用于救助学生和建设希望小学的孙尝勤；救助了 16 名失学儿童的陈秀珍；将一所全村最差的小学建设成为最好的小学的吴振铎……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从心头掠过。而让我们久久不能释怀的，是那张生命才刚刚走过 38 个春秋，却苍老得如 50 岁老人的山村民办教师的脸。……

罗田县胜利镇黄狮寨小学校长、工友兼全校 54 名学生的炊事员的张民主，是这个山乡小学唯一的一名教师。

这是个“鸡鸣两省”的地方，平均海拔在 800 米以上。1947 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曾在此打了一个大胜仗，因此才有了今天的胜利镇。而今，黄狮寨村 80 多户 472 人就散居在周围的 4 座山上，靠着挂披地和冷浸田过日子，去年全村人均纯收入不过 400 多元。尽管日子过得很艰难，但全村 54 名适龄儿童全部都在张民主的小学里读书。这里，寄托着全村老少的希望和嘱托。

21 年前，当村民们敲锣打鼓地把刚刚高中毕业的张民主接回村里时，张民主就想要为这个穷山村建一座小学，使村里的孩子们不再像自己一样非得得到 20 公里外的胜利镇，才能读上书。村里支持了他的想法，选出全村最好的一块地，村民们一把泥土一把汗水地筑起了两间“干打垒”，一间做教室，一间做厨房，纯朴的山民从自己家中拿来了桌椅板凳。看着这简陋却亲切的校舍，看着那些眼里充满了期望的父老乡亲，张民主上任了——那一年，他才 17 岁。

随后的 20 年里，张民主每天的日程几乎就是这样：早上 6 时起床，上山打足一天所需的柴草，然后回到学校那间既是教室又是卧室的房里备课和自学。吃过了早饭，他就站在学校的门口，看着学生们一个个的从山间小路上出现。几十名学生，四个年级全都挤在一间 30 平方米的教室里——这就是大别山里常见的复式教学班。张民主依次给四个年级讲课，从拼音字母讲到字名篇章，从语文、数学讲到品德、自然。一个年级的课讲完了，学生们自习，张民主接着给另一个年级的学生讲课。中午 12 时，张民主放下书本，拿起炊具给 54 个孩子做午饭。吃罢饭，稍微休息后，张民主又开始了讲课。放学了，张民主还要在暮色中把十几个孩子送回 10 多里外的家。

时光随小学旁那条小溪默默地流淌，正如平静的小溪也会翻起浪花，对于张民主来说，20 年的岁月中也有不少并不平淡的回忆。

1983 年的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像往常一样，张民主到山村山门为那些因大雪封山而不能到校的学生补课。就在他返回学校的途中，一只饿狼拦住了他的去路，两只通红的眼睛逼视着他。张民主急中生智，用手电的光柱死照住了饿狼的双眼，野狼呆住了。张民主乘机跑走，却在匆忙中失足摔下了山坡。他腿上至今还留着数寸长的疤痕。然而，这件事并没有阻止他

每年冬天去给学生补课，只是手中多了一根木棍。

1985年的秋天，四年级的一名学生得了急性阑尾炎，学生的父母慌忙中找到了张民主。他二话没说，赶到学生家，把他背到10公里外的卫生所，并为她垫付了医药费。

1991年夏天发大水，那天，教室的四周一片汪洋，孩子们在教室里吓得发抖。张民主披着蓑衣站在教室外挖排水沟。这时，妻子从3公里外的家中赶来告诉他，家里全淹了，责任田的粮食也快保不住了。望着憔悴的妻子，又看看惊慌的孩子们，张民主说：“你回去吧，我不能走。”妻子无言走了。

张民主很欣慰，自打有了这所小学，村里的孩子基本上是免费读书，不用交学杂费，20年来仅此项费用就是8000多元，而张民主还把他每个月17.5元的民办教师补贴，全部用于购买教具和垫付学生书本费。村里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失学的。1993年，张民主获得了全国希望工程园丁奖。

张民主也很内疚，1975年到1979年，他每年教书只能挣3600个工分，每个工分只有3分钱，1980年到1985年，他每年定额只有20元，有的时候甚至一分钱也拿不到。现在虽说每月能拿105元，但两个读书的孩子却花去了一大半。说到这，张民主泪流满面：“这20年来，一直是我的父亲和我的妻子在养活我，而我只能在星期天回去干点农活。”

然而，张民主心中最挂念的还是村里上学的这些孩子们。他说：“我现在只是个小教中级，按规定不能教五、六年级的学生。我也要多读书，争取把村小办成一个完全小学。不然的话，我觉得对不起那些还要到几十里外去读书的高年级的孩子们。”

在落后、偏僻的深山里，一群群像张民主这样的山村教师们，用毕生的精力在默默地耕耘，无私地奉献。他们像大山一样的脊梁，正在托起贫困地区孩子们的希望。

这些乡村教师，正如李岚清副总理所说：“……而对在山区和边远地区的农村教师来说，还应该在‘清苦’和‘崇高’前面加个‘更’字。”他们在教学与生计的两难冲突中，宁愿自己勒紧裤带，甚至牺牲自己的健康与爱情，也要使贫苦孩子都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奉献了自己所能奉献的一切。

欢迎仪式缺少“主角”

1996年11月3日上午，郑州市全聚德烤鸭店一派节日景象，这里将举行欢迎贫困地区学童参观省城的仪式。

原来，一位自称姓李的个体户青年自1995年春至今，拿出数万元救助100多名贫困失学儿童重新回到了学校。一年多来，他的唯一愿望就是能接几名贫困孩子到省城郑州来参观，一起合个影。

郑州全聚德烤鸭店经理听说了这个情况，被这位热心的青年的行为所感染，主动提出：把这位青年资助的学生代表接到省城与其见面，费用全包。

时针指向10点，有关方面的领导都到了，新闻记者聚齐了，工作人员就位了。然而，欢迎仪式的“主角”——那位热心资助贫困学童的青年却没有露面。他委托市“希望工程”办公室，给孩子们捎来了学习用品，并转告记者们，他不愿意接受采访，不想让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其实，这位青年也参加了仪式，但不是在他应站的主席台上，而是在离现场不远处的一个地方。市“希望工程”办公室的同志悄悄告诉记者（因为只有他们见过这位青年）：他是流泪看完了整个过程。他说，迎接孩子们的现场很热烈，他非常激动，他对社会各界给“希望工程”的关心和支持，以及对他本人的鼓励和帮助，表示深深的谢意。

仪式结束了，人们渐渐散去，记者们全部离去后，那位青年马上来到了孩子们中。在短暂的两天时间里，他带着孩子们登上二·七纪念塔，尽览都市风光，讲述了一个又一个革命故事……

“李先生”救助百余名贫困学童

“这位年轻人到底姓什么？”

郑州市“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既激动又无奈的说：“迄今我们办公室的人员都不知道他的姓名，职业和住址。”

“那么，你们怎么和他联系呢？”

主任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而是向我们讲述了两件事——

1995年4月的一天，一位衣着朴素，年约26、7的人来到“希望工程”办公室说：“我想救助失学学生，一个学生需要多少钱？”当“希望工程”办公室的同志告知他，救助一名小学生读完6年级需要400元学费时，他毫不犹豫地拿出4000元：“我救助10个！”

“希望工程”办公室的同志立即给他安排了10名相对集中一些的贫困生，并拿出孩子们的档案给他看。青年人发现每个孩子的档案连个照片都没有，又随即掏出100元：“让孩子们照张相吧，我也可留个纪念，以后好去看他们。”

“希望工程”办公室的同志请他在捐助卡上留下姓名和工作单位。这位青年马上推辞：“没有必要。”工作人员再三要求：因工作需要便于联系，请他留下姓名。他说：“我写‘李先生’吧。”并说出了自己的传呼机号。

以后，10名失学儿童一封封学习汇报信寄往“希望工程”办公室后，“希望工程”办公室就是靠这个传呼机号通知“李先生”来取。

1995年底，“李先生”向市“希望工程”办公室提出，要捐助100名失学儿童，并说一定要捐助最穷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新密市尖山乡是郑州市最贫困的乡村之一。他听后表示：将尖山乡的失学儿童全部包下。因为不够他要求的百名指标，工作人员又补充了一部分其它地区的贫困生。“李先生”当场兑现5000元，其余钱款保证在每学期开学前送到“希望工程”办公室。他十分动情地说：“希望这100个学生都能成材，如果他们能考上大学，我将来继续资助。”

“李先生”充满深情的话，深深打动了“希望工程”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心。有人随口而出：“你为什么对‘希望工程’这么一往情深？”小伙子说：“过去我的家境不好，没上过多少学。现在做点小生意，有点积蓄，但深感没文化的难处。每当在报纸、电视上看到一些贫困生无力交纳学费而上不起学时，心里就特别难受。”说着说着，他的眼圈红了。

“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说：“我们多次询问他的真实姓名和职业，他总是一句话：‘别管我是干什么的，有人做得比我更好。’”

山里人很想见见“李先生”

“李先生”不愿透露姓名，更不愿接受记者采访。我们通过“关系”几次约他，但他总是推脱了，不是工作忙就是“以后再说吧”。

见不到“李先生”我们只好去采访他救助的学童及其家长。

1996年11月6日上午，我们驱车前往巩义市鲁庄乡王窑村。“李先生”救助的第一批10名贫困学童，大部分都在该村。

驶进王窑，巧遇一群小学生放学。经打听有3位正是被“李先生”救助的学生：王支权，王奇辉，李芳芳。

我们问：“知道郑州的李叔叔吗？”孩子们说：“知道，李叔叔待俺可好！”并高兴采烈地领着我们去找校长。

“王窑太穷了。”校长介绍说，“这儿位于巩义、登封、偃师交界的山窝里，全村七沟八梁，年人均口粮仅二、三百斤，没有其它经济收入，村民吃油盐全靠养鸡下蛋去换。”说到这里，他眼圈红了起来，“温饱都难保证，孩子们上学就更可想而知了……”

在去受资助的王支权家的路上，校长告诉我们：“支权的爷爷常年有病，奶奶偏瘫卧床，还有个小妹妹。多年来，为给二老看病，家里欠了很多债，生活十分艰难。因为没钱，小支权直到9岁才上学。1995年，他的奶奶爷爷去世，又花了不少钱。眼看支权又要失学，多亏‘李先生’的资助寄来了。”

来到支权家，支权爸拿出去年底“李先生”给支权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王支权同学：你好。

……

你以后在上学方面尽管放心，我今天既然帮了你就一定会帮到底，决不会让你因为没钱而退学。我要一直帮你到读完大学，当然这还需要你去努力，我希望你的父母关心你的学业，不要因为农活要干或别的原因占用你的学习时间。你们家如果遇到别的什么困难，尽管给我来信，我会想办法帮助你们的。这里我给你寄去50元钱，你帮我给奶奶爷爷买点好吃的，让他们多保重身体。

你的朋友李 12.23

在“李先生”资助的另一名学童李芳芳家。芳芳爸说：“人家捐款俺妮上学，又不留姓名，真让俺感动。”他向我们讲述了这么一件事。

刚刚收到捐助款，几个孩子给“李先生”写学习汇报信时，有的称他“李伯伯”，有的称他“李爷爷”。后来“李先生”回信说，“你们不要称我‘爷爷’、‘伯伯’。我才26岁，就叫我哥哥好了！”

芳芳爸抑制不住激动，两眼含满泪花，十分动情地说：“‘李先生’不是一般的人，我看是第二个雷锋出现了……”说完，他从屋里拿出了“李先生”给他的来信。“李先生”在信中这样写道：

您的信中邀请我到您家做客，我非常感谢，等以后有时间我一定拜访您。这里我还要向您道歉，希望您原谅，因为我没有告诉我的真实姓名和地址，等芳芳考上初中以后，我再告诉您，到那时我就和您直接联系。

市“希望工程”办公室的同志告诉记者：“李先生”对捐助的每一个学生都是有信必复，每封回信都洋溢着亲人般的挚情，充满着真诚的希望。

一年多来，王窑村被资助的学童和家长，都千方百计地打听、寻找“李

先生”，非常渴望能见他一面。出过家门的王奇辉的母亲，独自坐车到郑州寻找“恩人”，跑了许多大街小巷，最终还是失望而归。

郑州几多“李先生”

“李先生”资助贫困学童，不留姓名的事迹在郑州报道后，“李先生”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人物。在赞扬“李先生”的同时，很多人主动提出要帮助“李先生”。一位自称“赵先生”的人给报社打电话，表示愿与“李先生”携手，面向社会，救助更多的贫困学童。这位“赵先生”仅留下电话号码，也是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和工作单位。

郑州市科技信息服务处的同志看了“李先生”的报道后，联名向市“希望工程”办公室要求：给他们每人安排一名贫困生。

1996年11月7日，记者在市“希望工程”办公室，恰遇一位新闻单位的中层干部来捐款。他说，在中学读初二的儿子平时积攒了400元钱，多次催他把这钱捐给“希望工程”办公室，说今天再不捐，就不吃饭了。

11月15日，一位身穿蓝色西装的年轻人来到市“希望工程”办公室，说是看了“李先生”的报道很受感动和启发，他把一张20万元的支票留下，其它什么也没说便离开了。

这几年来，我们遇到许多像“李先生”一样的无名英雄，市“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动情地向我们讲述了一幕幕动人的情景。

——1994年底，我们接到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一位同志转交的1000元捐款，说是一位老同志捐助的。因为没有姓名和单位，无法出具收据证明。询问转交人，他说捐款人会联系的。几天后，我们接到一位老同志的电话，他说就写“一个共产党员”吧。

——1995年3月，一位姑娘两次来到“希望工程”办公室，共捐76.89元。她说她在河南省物华饭店打工，叫“彭小小”。可工作人员几次打电话询问，饭店都说没有此人。

——1996年初春，郑州电子秤厂一位年轻人来到“希望工程”办公室，说是替一位老同志捐助，拿出一张1万元的支票就走了。

还有郑州铝厂寄来的汇款单，署名是“一群女职工”；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送来的集资款，留言是“全体官兵”；邮电部设计院两位老人捐助的退休金，只写下“一对老夫妇”……

普普通通的“李先生”就在我们身边

为采访“李先生”有关部门积极帮我们联系。“李先生”终于回话了，他诚恳地说：“我的确没做什么。”他表示同意见记者，但提出“三个条件”：不要问他的真实姓名，不要拍照，不要在报刊上发表。记者向他“承诺”：尊重你的要求。

1996年11月21日下午，在一个约好的地点，我们静静地等待着这位让人崇敬，又带点神秘感的年轻人。

2点30分，“李先生”准时来到相约地点，轻轻推开房门。我们都愣了，他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和想象中的他，有着较大的距离：一身普普通通的装束，文文静静、腼腆腼腆，清秀的面孔中透出几分精干，几分和善。

交谈中，我们了解到：今年27岁的“李先生”，是5年前来到郑州的，靠着别人借给他的2万元钱涉足商海。这位农村青年，起步经商非常艰难。身单力薄的他，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跑武汉，下石狮，去上海，风餐露宿；摆地摊，蹬三轮，早出晚归，数九寒天，手和耳朵冻得红肿，尝尽了苦头。虽是小本生意，但3年后有了自己的积蓄。就在这时，一个偶

然的事件触动了他的心灵。

“李先生”眼含热泪回忆了几年前的一件事，那是中央电视台的一次“综艺大观”节目，讲述一位家境贫寒的儿童，为了上学，被迫去卖冰棍，到了晚上还有 10 根没卖完，眼看都要化了，孩子只好挨家挨户跪着求人家买下……看到这里他哭了，“我一定要帮助这些孩子。”

此后，这个愿望一直强烈地占据着他的心头。不久，他在报上看到郑州市“希望工程”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便由此开始了捐资救助贫困学童的事业。

“李先生”说，自己也是出身于农村贫寒家的孩子，但没有像这些贫困区的孩子穷到上不起学。每当他从报纸、电视上看到这种事就伤心……

言谈中，我们得知“李先生”不仅捐助了 10 名贫困学童，而且自助其它贫困地区的学童从 1993 年就已开始了。但他不愿再谈细节。

“李先生”对贫困学童、“希望工程”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问他，前几天的报道你见了么？他说：“见了。尤其是你们记述去山里贫困学童家那一篇，我一字一句读完，实在控制不住，失声痛哭起来，竟忘了自己在工作岗位上上着班呢！”他对我们说：“他很想到山里去看看这些孩子们。”他表示，捐助贫困学童的事不会间断，以后每年还要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捐助给“希望工程”。

“李先生”和我们握手告别，他立即融入了街上如潮的人流。“李先生”是一个普通的市民，他就在我们身边。

浸透大山的情谊

九月，宜昌市伍家岗区教育局长一行专程到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傅家堰乡，为他们救助的 186 名失学儿童送来了新学年的费用。第二天就要启程离开了，学生家长和学生 100 多人从四面八方赶到车站送行，挥泪告别“亲人”。这感人至深的情谊，比血更浓，比海更深，她跨越关山阻隔，踏平雄关漫道，穿透茫茫群山！

—

1994 年 8 月 2 日，伍家岗区教育局长一行，经原市教委主任的介绍，首次沿着坑坑洼洼的乡村公路，来到全市 18 个特困乡之一的五峰傅家堰乡。他们扛着摄影机，深入全乡 7 个贫困小学，50 多名特困学生家庭，进行走访。在白庙村一组农民张兴家，局长曾承红听说张兴的妻子出走，当即拿出 100 元，给两个光着身子的孩子各买了一套衣服，并结了帮扶对子。

摄像机摄下了傅家堰乡学校的破败，失学儿童的艰辛与眼泪。他们回到城区，利用暑期集训，组织 600 多名教职工轮流观看，山区的贫困牵动着城区老师的心弦。很快上至伍家岗区委书记，下至全体教职员，还有部分学生迅速与傅家堰 100 多名失学儿童结成了“手拉手”的帮扶对子。

顾亮亮、李万清、张芳芳们复学了；父亲早逝，母亲常年卧病在床的张健波、张玉银兄弟复学了……

在救助与被救助的关系中，有很多动人的故事：

他叫李万清，家住傅家堰大龙坪村二组，就读于渔洋关二中。他从局长手中收到了伍家乡副乡长翟文莉救助的 200 元学费和一封催人泪下的书信：

万清同学，你好？学习进步？1994 年以来，伍家岗区区长李国树伯伯支持你读完了初中。今年 4 月，他不幸患肠癌，告别了人世。临终前我到医院去探望他，他向我介绍说你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干部，可家境十分贫寒，上学时，连几分钱一支的铅笔也得靠老师或亲戚救助。他嘱托我一定要扶持你上高中、上大学，把你培养成祖国有用的人才……

李万清读着来信，大滴的泪珠，簌簌滚落。

伍家岗小学校长孙清岑，区教研室副主任，自己还是组织照顾的对象。但他说，再穷穷不过傅家堰的失学孩子，他也加入到救助行列。有些年轻教师工资不高，他们三、四人凑在一起，包下了素不相识，远在五峰深山的孩子上学的费用。

傅家堰乡 186 名失学儿童，被来自城区的一封封来信重新点燃了希望的火花，来自领导、教师、学生的慷慨捐助，帮助这批不幸的孩子走上了幸福之路！3 年之中，伍家岗区的职工和师生为 186 名失学儿童捐赠人民币 20075 元，为全乡 3000 多名学生捐赠衣物 5 万多件，人均达到 15 件，捐赠学习用具 3000 多件……

二

10 月 2 日，傅家堰乡白庙村 100 多名家长聚集到白庙村小学，参加义务劳动，宣告由伍家岗区 7000 多名师生节约每一分钱援建的白庙“牵手小学”

破土动工。

白庙村小学，原是一所 70 年代修建的土墙屋，120 多名师生挤在光线暗淡，已属危房的 3 间教室里学习。伍家岗区教育局曾承红一行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心情很不平静，他们回到单位，立即召开会议，专题讨论，作出了开展“在全区师生中开展每天节约一分钱，援建一所希望小学”活动的决议。

以学校团组织牵头负责，7000 多名中小學生积极参与的“每天节约一分钱”活动迅速掀起了热潮。伍家岗区实验小学校长谭玉梅，把这项活动提高到培养学生关心他人和艰苦朴素良好品行的高度来认识，组织专班，认真开展工作，坚持 3 年，从不间断。积少成多，聚沙成塔，伍家岗区实验小学学生已节约零钱达 800 多元。

杨岔路小学 9 岁的小女孩陈慧君与傅家堰乡桥坪小学的覃远州同学“手拉手”3 年了，鸿雁传书，在宜昌与五峰之间架起了一道友谊的彩虹。陈慧君把爷爷奶奶给的压岁钱，买文具和学习资料寄给覃远州，还每天省下一毛钱，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节约分分钱活动，在白庙村牵手小学的捐献中她有 100 多元的贡献。

像陈慧君这样的小朋友，何止一个，两个。许多个叫不出名字的小朋友，把希望寄进了大山，把甘露渗进了干涸的心田，把友谊的种子播洒在人间！

“几千名师生 + 1000 多天 = 6 万学生”，伍家人用爱心创造了这个等式。一所白庙“牵手小学”，是伍家人在五峰大山中树起的一座丰碑！

“援助的不仅仅是物质，还有金子般贵重的精神”，五峰县教育局局长说。

伍家岗区各校，3 年中为傅家堰的“普九”，捐赠课桌、图书、风琴、录相机、电视机等成套设备 5000 余件……

今年暑假，十五中附小张虎明校长带着学校 17 名教师，39 名学生组成的夏令营专程到傅家堰乡与手拉手的小朋友见面，开展联谊活动。有几名优秀教师为傅家堰乡 100 多名教师示范公开课，传经送宝，还给教师赠阅教改教研资料 2000 多册，使全乡 170 多名走不出山的教师，了解到素质教育的最新信息。

伍家岗为傅家堰乡捐赠的每分钱，每件衣物都有一个人的故事，都有一颗滚烫的爱心！这种无私的援助，给山区带来了脱贫的精神动力，带来了鞭策与鼓励，带来了信心和力量！这是一股穿透群山的情谊！

金盾情系“一助一”

唐山市公安局新区分局 144 名普普通通的干警，从自己微薄的工资收入中抽出数万元来，广泛资助辖区内的贫困学生。

一年来，144 名干警与区内 22 所学校中的一百四十四名贫困学生结为对子，开展“一助一”活动，拂去了笼罩在孩子们心头的愁云，留下了许多生动感人、催人泪下的故事。

那是 1996 年初，唐山市桥区银城铺乡李庄子小学的 4 名学生因家境贫困面临失学。银城铺派出所的 4 名民警知情后，主动对这 4 名贫困学生给予了资助，使他们重返学校安心学习，这一行动受到当地群众广泛赞扬。事后当分局领导了解到区内其它一些学校也有些学生被家庭经济困扰，难以继续读书或不能安心读书时，分局党委先后 3 次召开会议讨论此事，感到人民警察应该向这些贫困孩子伸出援助之手，帮他们顺利完成学业。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局干警的热情响应。

王春香、王春艳姐妹俩是唐山市第 67 中学的学生，由于爷爷、奶奶年迈，母亲体弱多病，一家 6 口人仅靠父亲做临时工的收入维持生计。春香、春艳虽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可家庭实在供不起她们继续读书，姐妹俩曾一度失学。“一助一”活动开始后，分局局长尹春玉、三科科长张堂担负起资助春艳、春香的责任。除为她俩交学费外，尹局长、张科长还不时为她俩送去学习用具、书籍和衣物。

在“一助一”活动中，燕山路派出所所长于志耕号召民警“少抽一盒烟，少买一件衣服，把对子女的爱分出一部分给贫困的孩子们”。于是，干警们每人每月拿出 30 元钱分别负担燕山路小学 9 名孩子的学习费用。干警们不仅关心着 9 名贫困学生的学习，而且也关注着全校学生的成长。他们每季度给学生讲一次法制课，教育同学们知法守法，做遵纪守法的好少年。

干警们辛勤的浇灌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一助一”活动使每一位被资助的学生无论在学习上和思想品德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被资助的 144 名学生中，学习成绩排名班级前 10 名的就有 68 人，并有 21 人在校、区、市级单科竞赛中获奖，有 24 人已考入大中专院校和重点中学深造，40 名学生被评为区、市级“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第 74 中学的一位教师十分感叹地说：“一助一”活动为学校教育学生提供了生动的教材，民警们无私奉献的行为胜过学校千言万语的说教。

“一助一”活动不仅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也使广大民警受到了一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分局预审科科长郑远忠、民警周贵柱、于占东等人的妻子均因企业效益差而下岗，家庭生活困难，但他们也积极主动参加了“一助一”活动，为孩子们奉献着一片爱心。截至目前，全分局民警已为贫困学生捐款达 37000 元，做好事 1000 余件。

通过“一助一”活动，全分局广大民警增强了主仆观念，强化了无私和奉献意识，整个队伍充满着一股强大的、积极上进的力量，各项公安保卫工作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爱的奉献

1992年4月16日，新华社、人民日报等首都各家新闻单位发出“百万爱心活动”这条消息的当天，“南京路上好八连”指战员坐不住了，他们自动和青年团山东省委取得联系，要求加入这项“爱心工程”行列。不久，八连官兵和位于沂蒙山老区腹地的沂水县48名品学兼优的失学儿童开始了结对帮助。“献上一元一角一份爱，帮助沂蒙山区失学儿童”的活动在“好八连”营区展开。为了给孩子们多一点支持，这个艰苦奋斗典型连队的官兵更加节俭，每一分钱都掂量着花。战士王利铭，当兵4年来，平均每月只零花6.1元，而捐给希望工程达300多元。九班战士陈则进1994年又创造了一个“新纪录”——全年只花63元钱，平均每月不足5.3元，而这一年他给帮助对象沂蒙山柴山乡里坊小学的王德全小同学汇寄了130元助学金。

1992年底从江苏溧阳入伍的战士葛国军是上海警备区挂了名的“特困户”——全家4口人，父亲得了咳喘病，常年服药，不能干活；母亲得了胃癌，卧床不起，大姐从小患小儿麻痹症，是个残废，唯一健康的二姐也因家境所迫远在海南打工。在私人洋房、楼房林立的江南水乡溧阳，他家至今住的仍是几间茅草房。像这样一个困难的家庭，每一分钱显得何等宝贵啊！在班长伊延辉的带领下，班里的战友时常悄悄以小葛名义往他家中寄钱。然而小葛毅然决定加入了“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的行列，他和柴山乡中心小学于富海同学结上了对子。于富海至今也无法想像帮助他读书的葛国军叔叔和他的家庭一样困难，是无私奉献的爱心把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三年来，一张张汇款单从大上海飞往老区失学儿童的手中，40多名沂蒙人民的优秀后代重新获得了学习的机会。在沂水县国际希望小学五（1）班的黑板上，一位由八连战士助学的孩子写了一篇以《八连叔叔救了俺》的文章，读来催人泪下：“俺叫魏培宝，是沂水县国际希望小学五年级学生，前年父亲得了直肠癌，花了上万元，失去了劳动能力。老师对俺非常关心，免收了俺们部分学费，平时的学习用品靠妈妈几个鸡蛋供给俺。去年妈妈积劳成疾，经常害病，再也无力供俺上学。俺已和妈妈商量好，准备退学。4月16日，俺正在上课，邮递员把‘南京路上好八连’给俺寄的第一学期‘希望工程’助学金30元汇票送到俺手中，俺拿着汇票一蹦一跳地跑回家送给了妈妈，并跟妈妈说明了汇票的由来。妈妈接过汇票，攥得紧紧的，好长时间未松开手，泪水不断线似地往下滴。妈妈含着热泪抚摸着俺的头说：培宝，是‘好八连’叔叔帮了你，你要学好文化，将来报答叔叔对你的帮助。妈妈的一番话说得俺心里热乎乎的，俺双手抱住妈妈握着汇票的手，不由自主地扑进妈妈的怀里，泪水不住地涌出。”

在帮助沂蒙失学儿童的“好八连”指战员中，不论是家庭条件好还是家庭条件差的，每一项援助，都是一首感人的歌，每一个帮助对子，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于是在这爱之歌里，又一个故事抡起了——

爱的升华

爱，在人类情感中是至高至上的。爱，架起了人们心灵之间的桥梁。爱，使人们的灵魂得到净化，境界得到升华。

沂水县柴山乡中心小学五年级的王树欣同学品学兼优。他的爸爸王绍杭曾是一位打过仗的军人，后负伤复员回家，但旧伤时常复发，平时不能下地干活，沉重的家庭负担全落在母亲的肩上。母亲积劳成疾，也经常生病，本来连正常生活都难以维持的家庭一下子更陷入困境，负债累累。王树欣放学回家后既要照顾生病的妈妈，又要看护年幼的小妹妹，成绩直线下降。病中的父母相对垂泪，对树欣说：“孩子，退学吧，爸妈对不起你呀！”一家几口哭成一团。“我要上学，我要读书！”小树欣拉着妈妈的手跪在地上……然而如此的家境又如何供得起他继续读书呢？听到学校上课的钟声，他总是冲出门外，远远地望着学校方向落泪……

就在王树欣辍学的几个月后，“好八连”战士王国华、罗林青的援助金汇到了中心小学。从此，小树欣和两位八连叔叔结成了对子，重新返回了朝思暮想的校园。小树欣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成绩逐渐进入先进行列，升入五年级后，期末考试总成绩名列全班第二名。由于经常通信往来，八连战士无私奉献，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深深地感染了小树欣。在他的倡议和学校的支持下、八连指战员的帮助下，柴山乡中心小学的孩子自发组织了一个“柴山小八连”，王树欣担任连长。他们以好八连为榜样，以助人为乐、勤奋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节假日和课余时间开展一系列公益活动。

一位同学因生病几天未能到校，“指导员”于增娟坚持每晚步行几里路，赶到这位同学的家里帮他补课。“小八连”战员于富海同学捡到一角钱，立即上缴学校，说是八连叔叔教他这样做的。黄翠同学刨到几株山菊花，栽在学校的花池中美化校园。王德全同学得知同班的小胖佟声华忘了捎饭，主动把自己的盒饭让给他吃，还拍拍肚子声言自己早已“撑饱了！”上学放学的路上遇到老人他们总是抢先上前扶一把，遇到推车上坡的叔叔、伯伯，“小八连”战士们立即上去帮助推一把……

今年1月8日，“好八连”所在的团政治处干事苏仁和“好八连”战士王国华千里迢迢到沂蒙山看望学生。“小八连”连长王树欣做梦也想不到帮助自己3年多却从未见过面的王国华叔叔竟会来到自己面前。当王叔叔握住他的小手时，他好久说不出一句话，眼眶一酸，两行热泪止不住地滚下来。他向王叔叔汇报了自己的学习情况，说自己的成绩一直保持在前列4名。王国华当场拿出20元钱来奖励小树欣。树欣的母亲黄秀英含着眼泪说：“你们每月仅30多元的津贴，自己舍不得花，拿来帮助俺。俺一定让孩子好好学习，报答解放军的恩情。”临别了，一家人流着眼泪为王国华送上了几个自制的柿饼，要他带回连队，让战士们尝尝沂蒙山的甜柿子。

八连指战员一封封信函，一张张汇款单，把甘甜醇厚的人间真情寄到沂蒙山区，也寄到老区人民的心坎上。据统计，三年多来，八连官兵和受助儿童及家长、学校间的通信逾千封。总资助额为6880元。老区人民也像当年拥军支前一样，将一双双绣着花朵和“鱼水情深”等字句的鞋垫寄到八连战士的手中。每逢节日，他们无论如何也要给战士们寄上几斤花生，柿饼等土特产……“希望工程”把“好八连”这个人民解放军的英雄连队和革命老区沂

蒙山区人民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

1992 年以来，八连官兵结对帮助的 48 名学生中，已有 8 名学生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小学课程升入中学读书。现在帮助的 40 名学生在各年级学习成绩均名列前茅，其中 21 名担任了班里的干部，被评为“三好学生”。如今，在“好八连”的影响下，其所在部队的其他连队指战员全部加入了“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

她，献出去的是爱心！

一

熟悉李范懿的人都觉得，老太太这几年太辛苦了，塌天般的祸患总是接连不断地降到她的头上。

她原在大连市甘井子区凌水子农业银行工作。1986年离休后，便同丈夫于呈甫在沈阳军区司令部大连第一干休所安度晚年。于呈甫离职休养，是正师职领导干部，虽然戎马一生，在枪林弹雨里钻了多年，可他的身体特好。1984年下岗后，他携妻带女住进了大连海滨最迷人的地方——黑石礁，一家人在这里过得很温馨、惬意。可万万没有想到，在1991年春节时，于呈甫忽然觉得胃有点不好受，几天后，一检查，胃癌，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了。李范懿慌了，忙不迭地说：“到北京，找人看看病吧！”于呈甫怕给部队增加负担，断然拒绝了。1992年10月6日，67岁的他就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花团锦绣的人世和心心相印的老伴。

李范懿悲痛欲绝，几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他们志趣相投，相濡以沫。骤然间，一方突然离去，剩下一方形单影只，终日以泪洗面。

1993年8月12日早晨，李范懿恹恹的起了床，没走几步就倒下了。人们把她送到医院，才知道老太太早已患上了脑血栓，半边身子都不好使了。住院，打针，吃药，理疗，足足折腾了3个多月，她的病终于好了。医生想让她出院，带着欣喜的心情为她做了多项检查。不料，又发现了比脑血栓更危险的信号：尿蛋白里出了4个“+”号。医生慌了，直言相告，你的肾有病，我们这里治不了，赶紧转院吧。

李范懿赶紧到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去查。千真万确呀，她得了严重的尿毒症，两个肾均有毛病。这种症，近乎绝症，目前在世界上最好的办法就是换肾。医护人员怕她有思想负担，起初把病情瞒着。但她三天两头昏迷，医生不停地为她输液，打血浆。两个月后，老太太觉得自己的病也不是好症候，就流着泪央求医生说：“大夫，你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吧。如果我的时日不多了，我还要完成一件丈夫嘱托我的很重要的事情……”医生也流着泪，把一切都告诉了她，最后婉转地说：“如果不换肾，大约还能活1年左右……”

李范懿所在的凌水子农业银行领导赶到医院，对她说：“换个肾，能够活些日子，你就换吧。一切费用银行负担！”李范懿说：“我不能让银行负担，现在，我已经离休了，不能为国家做啥贡献了，换个肾多活10年8年，还有多大意义？”银行领导和医生无论怎样劝说，她都没有答应换肾。几天后，她出院，分别找到干休所和银行的领导，说出她要办的那件大事情。

仿佛石破天惊，仿佛雷拍地撼，凡是听到的人全呆住了。

二

李范懿所说的大事情，就是要把自己同丈夫一生积攒的10万元捐献给“希望工程”，资助那些失学儿童。

他们积攒这10万元钱，可不容易啊，全是肚里省，口里挤，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这对夫妻勤俭持家，淡泊度日，在大连军队干休所是出了名的。几十年来，于呈甫的衣着始终是部队发的黄军装，内衣内裤都是妻子动手缝

制的。他最好的一件衣服便是毛料做的上衣，后来还送给哥哥了。他患癌症离世的前几天，预感自己不行了，就叫妻子把一身旧军装浆洗好，放在枕边，准备穿它走。李范懿不忍心，在丈夫逝世后，给他穿了一身呢子装，还是1955年授衔时发的衣服。这些年来，夫唱妇随，李范懿也始终是一身很土气的旧装。她到省里开会，穿着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的黄秋衣，黑棉袄，好多人说她是“50年代的农村老太太”。走进他们的家，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位正师职干部的家，屋内连一件现代化家具也没有，甚至连普通人家都有的彩电也没有。最高级的家具是一个大立柜，两个沙发，一张写字台，还是营房配给的。坑洼不平的地板是夫妻搬家时用包装箱板钉成的，台灯是手工镶成，铺盖是几十年的旧军被。他们日常生活也极为简朴。女儿出嫁和女婿回门时，按大连习俗，娘家至少要准备8个菜。李范懿破例做了10个菜，于呈甫不仅不动一口，反而批评了妻子一顿，剩下的菜让女儿女婿带回家。有的老干部劝他们说：“老于啊，不要抠得太狠了，想开些，枪林弹雨那些年了，自己挣的钱，该享受就享受些，别太亏了自己。”于呈甫说：“我想得开，一切都挺好的。我攒点钱，准备办件大事。”

于呈甫所说的大事情，是夫妻俩早在多年前就商量好的。他们想积蓄一些钱，在离世前支援国家建设，或者交党费，为党再做一点贡献。1990年夏天，大连市搞“希望工程”义演，夫妻俩看到革命老区那样困难，还有很多儿童连衣服也穿不起，连学也不上了。回来后，他们流了很长时间的泪。于是，他们商定：把钱捐给老区。这项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于呈甫便病倒了。在医院里，于呈甫念念不忘这件事情，他对妻子说：“我不行了，你把这件事情办好。如果有困难，就找军队干休所和农行的领导，请他们帮助你……”李范懿流着泪答应了。没想到，她也没来得及实施，就也病倒了。

但是，李范懿是位坚强，执著的女人，她要办的事情，就是遇到天大的难处也不回头。

两处的领导听了她的打算，眼眶全湿了，都劝她说：“你们的心情，我们理解。可是，你现在有病啊。你不想给国家增加负担，您就拿这笔钱给自己治病吧。就是老于，他也能理解。因为他生前不知道你有这么重的病，就是他活着，肯定也得这么办……”李范懿只是摇摇头说：“不！”领导说不通她，就流着泪答应了。

于是，李范懿忙颠颠地向上级写信了，她不知道国家的“希望工程”的地址，就往北京写。她一连发了4封信，都因地址不详，没有回音。第五封信，她发了双挂号，特快专递。这回，联系上了，团中央“希望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涂猛同志亲笔给她写了回信。

他给她提供了4个地点，有河南、陕西、湖北、贵州。李范懿相中了湖北省秭归县。

李范懿怀着兴奋的心情，拖着病体奔跑，联系着。她觉得这件事情是丈夫生前已经同她商量好了的，并且经过大连市公证处公证过了的，很容易办好。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件好事首先在她家里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为了春意盎然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建立“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基金”的宣传提纲中宣称：我国基础教育的现状并不乐观，目前正处在一个捉襟见肘，步履维艰的窘困境地……

中国今天仍是“第三世界国家”。也许，经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最主要特征，便是基础教育落后，文盲多。在全世界 8.9 亿文盲中，我国占 2.29 亿。也就是说，全世界每 4 个文盲中，就有一个是我们中国人！

在我国，整个 2.2 亿学生中，三分之一左右只能读到小学，三分之一读到初中，读到高中的不到 30%。而且，我国中小学生流失量近年仍是上升趋势。从 1980 年到 1988 年，全国流失生高达 3700 多万。这么多“祖国的花朵”失去了园丁的栽培，成批成片地被移植进“文盲”的荒野，该是怎样地令人心悸！

以甘肃省为例，目前全省有文盲、半文盲 624.8 万人。仅 1990 年，就有 10.11 万适龄儿童未能在金秋季节跨进哪怕最为简陋的校门。在这 10.11 万失学儿童中，有 8.66 万是刚刚扎起小辫的女孩子……

即便是跨进了校门的孩子，由于学校教育经费的贫乏，教学条件的窘迫，师资力量薄弱和教学水平的低下，又怎能保证他们受到合格的教育，怎能从小就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基础教育的现状如此，四个现代化的前景何在？

与发达国家相比，日本早在 1907 年就普及了 6 年制小学教育，我国最少落后日本 80 年——我们将继续落后到整整一个世纪吗？

不愿落后，不能落后，要奋起直追，迎头赶上，全社会动员起来，全力帮助贫困地区失学的少年儿童——这就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基于我国的基础教育现状所推出的“希望工程”。它的目的，是要在贫瘠的文化沙漠中培植绿洲，疏引清流，诱来千鸣百转的小鸟，呼唤阳光明媚的春潮。因此，实施“希望工程”被称之为“兴学助教伟大创举，造福社会的义举，功泽千秋的善举”。

共青团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委员会，在陇原大地的“希望工程”中率先破土。他们创建的厂县挂钩，扶贫助教的“兰渭模式”，为这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宏伟工程，成功地奠定了一块闪光的基石……

二

渭源县北寨乡北寨小学距县城 38 公里。在这个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人均年收入仅 200 元的贫困地区，能坚持办一所三级管理的完全小学已属难得，但学校的教学条件怎么样呢？校舍年久失修，破损不堪，教室的墙壁顶棚包括黑板都已斑驳陆离，全校 210 套课桌凳有 170 套是东倒西歪地勉强支撑使用。19 名教职工，396 名学生，每月的办公费只有 51.45 元，连电费都不够支付。一个教师每学期只发一盒粉笔，一瓶墨水，提前用完了就得自己掏钱买，讲桌上排放的几颗粉笔头只有黄豆粒大小了，还没有一个人舍得扔。而最要命的花销不是墨水，而是饮用水。吃水要从 10 里外雇车拉，每月两趟也要开支几十元。水拉来存入水窑，水窑的钥匙由校长亲自掌管，老师和学生统统按定量配给。谈起教学，教导主任辛酸地说：“在我们这所学校，唯

一的教学资料是历年学生的一份花名册，唯一的文体用具是一架老手风琴，我上学的时候老师用它教我，现在我还得用它教学生……”

但，即使条件这般艰难，学校还是坚持在办。北寨小学的老师们在谈及学校需要解决的最大困难时，不提钱，不要物，却异口同声地表达了同一心愿：培训师资力量，提高教学水平！

多么可贵的心愿！也许正因为此，兰化公司团委选定北寨小学作为此后新的“兰渭希望小学”的校址。

兰化公司是“希望工程”全力以赴的支持者和最早实施者。早在1989年10月，公司团委就及时印发了《为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募捐致全体团员青年书》，发动全公司的团员青年为失学少年儿童募捐。公司党政领导听取了团委关于开展这一活动的思想和情况汇报后，非常重视，在党政联席会上专门进行了研究，并且纷纷带头解囊。公司团委不失时机地将募捐活动转化为在全公司开展的以“爱国助教”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激发起广大团员青年为国分忧的主人翁责任感。到11月底，全公司3万多名职工和学校的少先队员共捐得现金22596.90元，图书28667册，教具文具1850件，可以说尽快为“希望工程”引来了一股沁人心脾的清流。

新绿既起，耕云播雨，兰化公司团委从募捐活动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决定将救助的目光延伸至长远，在“希望工程”中摸索出一条新路子，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他们将捐得的款项为公司的扶贫地渭源县建立了基金，每年以利息救助当地100名失学儿童读书复学；又经过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包括到渭源县实地考察之后，最终创出了“希望工程”的最新项目“兰渭模式”。

“兰渭模式”采用“普遍救助，重点扶持，就近就便，厂县挂钩，承担责任，一包到底”的工作方针，广开救助渠道，集资来源，多创救助形式，通过“以村带乡，以乡带县”的具体规划，在局部形成小气候，造成影响，进行扩散，从而实现集资救助的一体化，取得“希望工程”整体规模效益。

选定北寨乡小学作为重点救助的对象之后，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兰化公司、渭源县3方联合投资三万元。加上公司的实物援助，总计7万元，在北寨小学的基础上，改建扩建，购置文具教具，创立“甘肃省兰渭希望小学”。这是继安徽省金寨县希望小学建立以后，全国第二所“希望小学”，也是以“厂县挂钩”形式创办的第一所希望小学。她在陇原首先落成，为改变全省乃至全国更为紧迫的基础教育现状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二

1990年4月14日中午11时，渭源县天气骤变，原已阴晦的天空突然大雪纷飞。兰化公司团委副书记李恒森带5名团干部离开渭源县返兰，这已是他为了兰渭希望小学的建立，第10次到渭源县农村开展工作了。本来县领导要留他们吃午饭的，李恒森考虑到贫困县的实际状况，坚决辞谢了主人的挽留，执意启程。车行至渭源县半阳坡时，因避让行人车辆，车轮在雪地上猛一打滑，霎时连翻两个跟头。坐在驾驶员旁边的李恒森一头撞在后视镜上，当场头颅破裂，血流如注，昏迷达50分钟，被立即送往竹乡卫生院抢救。在不施麻醉药的手术中，头部整整缝了61针，失血1000多毫升。接回兰化医院后诊断为：颅脑伤二度，失血性休克。李恒森，这位兰化创业者的后代，在团的岗位上工作了10年的老团干，即便在病床上也不改他“乐天派”活泼

戏谑的性格，他对前来探视他的领导和同志们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表示：这就叫为了“希望工程”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多么感人的语言，多么真诚的形象！我们有这样的好团干，“希望工程”有这样不辞劳苦、不避艰险甚至不惜牺牲的开拓者和实干家，不正是“希望工程”的最大希望所在？

现在李恒森的左颅底还留有淤血，稍一劳累激动，就会被眩晕、失明所折磨，每天晚上都得吃安眠药才能入睡。但他入院后的第5天，就开始在病床上过问处理救助北寨小学的具体事务。7月份，他又带着公司的团干部第15次、第16次地奔波在兰州至渭源的公路上。

经过李恒森和团委一班人的努力，“兰渭模式”的落实立见成效，“兰渭希望小学”的教学条件迅速改观。校舍教室的改建扩建完成，整个被修缮粉刷一新，购置捐助的文具教具图书全部运抵。为了保证救助工作的长期性和有效性，公司团委还制订了二级团委接力扶持活动，20家基层团委（总支）每家一个月，轮流传递，交班扶持，送去了黑板漆、粉笔、铅笔、本子、电铃、电子琴、单双杠、篮球架、登高架、水桶等物资达700多种（套、盒、件），又整体武装了小学的鼓号队。“兰渭希望小学”一下变成了渭源县乡村小学家家欣羨人人关注的崭新的模型。

1990年9月1日，“兰渭希望小学”正式举行落成典礼，渭源县十里八乡的村民和小学生们像迎接一次旷古未有的盛典一样迎接这个日子，从天亮起就在蒙蒙细雨中翘首盼望，整整站了5个小时。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洛桑、甘肃省副省长张学忠等各级党政领导兴致勃勃地赶来为希望小学揭幕剪彩。当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和兰化公司党委书记侯绍健共同揭下那块大红方绸，“希望小学”4个大字赫然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全场掌声雷动，学校的老师和围观的乡民们无不热泪盈眶。此情此景，令兰化公司的一位基层干部含泪赋诗：

我是一个山区的孩子，
我不要漂亮的衣裳，
不要洁白的手帕，
我要读书。
让自己也成为一颗小星，
在队旗的火炬中闪亮，
闪亮在故乡黄土地上，
希望的辉煌。

渭源县一所小学在致兰化公司的感谢信中发出这样的肺腑之言：“穷人是最容易记恩的，你们对教育事业的救助，功泽桑梓，渭源县的子子孙孙都要感谢你们！”

原北寨小学现“兰渭希望小学”的两名学生将签满全校师生名字的红领巾，赠送给基金会和兰化公司的时候，两千多人的会场再次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三

触景生情融兴教之景生爱国之真情，
饮水思源饮兰化之水恩育我之渭源。

这是笔者从兰化公司团委主办的“兰化青年”小报上信手摘录的一幅对联，联未必精工，却十分形象地道出了“兰渭模式”厂县挂钩，扶贫兴教之真谛。

兰化公司团委在利用捐款设立救助基金，每年救助渭源县 100 名失学少年儿童续学复学和积极扶持创办了希望小学之后，并不认为工程的实施可以告一段落。他们把“希望小学”做为本公司中小学生学习开展社会实践的基地，组织学生利用假期在那里进行社会调查，中小学文化补习，开展实用技术培训等活动，专门指定公司第二小学和“希望小学”结成联谊学校，经常性地开展双方教学竞赛，管理协作，教学观摩以及交换资料试卷等活动，促进了城乡小学教学水平的共同提高。公司团委实践自己的诺言，以第二小学为基地，对“希望小学”的教师进行轮训，力争在两年之内轮训一遍。在两校的少先队员之间，团委积极倡导了“手拉手”活动。让中队与中队，小队与小队之间开展各类有益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竞赛，派第二小学的辅导员前去训练“希望小学”的鼓号队。特别是去年暑假期间组织的兰渭小学双向“希望之星”夏令营，即让兰化第二小学的“城里娃”深入山乡农村，感受到农民伯伯耕种收获之不易和生活的艰难；又将“希望小学”的“乡里娃”迎进省会城市，让他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懂得只有学好文化知识才能治穷致富的道理……。

公司团委的同志很动情地说：“这些‘乡里娃娃’太苦了，到了我们这里住宾馆吃餐厅说是天天过年，比过年还享福！他们也是 90 年代的新一代，不该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吃苦耐劳又孤陋寡闻，我们真想让他们多享几天‘福’，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啊！”

这样的动真情，下真功夫，花大力气地实施“希望工程”，甘肃省乃至我国的基础教育现状怎么会不发生一个大的改观，出现一个新的跃进！正如前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同志赞叹的那样：希望工程都像兰化公司团委这样搞，“希望工程”就大有希望了。

那么，兰化公司团委创立的“兰渭模式”对于我们整个“希望工程”的实施，提供了哪些有益的启示呢？

1988 年 12 月 23 日，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在七届人大十一次会议上汇报教育工作时指出：“解决教育经费问题，要从我国国情出发，逐步完善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体制。”“兰渭教育模式”不仅开了教育经费之新源，而且把厂县挂钩，企业扶贫的工作发展到全方位，提高到一个新层次，开辟了智力扶贫的新领域。所谓治穷根，其根本只有加强基础教育，提高经济落后地区的整个文化知识水平，才能真正摆脱贫困，治穷致富，造福子孙后代，焕发出整个民族振兴的蓬勃生机。

兰渭模式体现了共青团全心全意为青少年服务，为国分忧的热情与真诚；证明了团组织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青少年做更多的实事，可以依靠自己的系统和整体力量保障广大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包括青少年受教育的权利），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即以“厂县挂钩”而言，它也为企业团体的共青团走向社会化团组织，肩负的不仅是岗位责任，同样也挑着一代人的远大奋斗目标作贡献。兰化公司团委能做到这些，其它大中型企业团组织不是也可以进行类似的尝试吗？

再者，“兰渭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省情、国情、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宣传的好典型。因为国分忧而去救助贫困地

区失学少年儿童，激发了爱国主义热情，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救助的失学儿童，包括他们的父兄和当地人民群众，也同样会激发起爱国热情，亲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的青年，我们人民的思想境界必将因此提高——

如果您捐赠 20 元，就为一名贫困地区的失学少年交纳了一个学期的书本及杂费，就等于为救助失学青少年作出了最实际的贡献，如果你捐赠 100 元，200 元呢？

这笔钱，就算您在繁华都市的卡拉 OK 之夜，唱了一支动情的歌吧……

钟情支持祖国的教育事业 ——记来辉武教授

来辉武——一个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名字。

他发明了 505 神功元气袋，开创了“内病外治”的新纪元。

近几年内，他时刻不忘教育，捐资兴教助教，共向教育界捐款 3000 多万元。

在 505 集团采访，记者听到许许多多关于来辉武教授助学兴教的故事。

一天，在 505 集团的接待室，记者见到一位衣衫破旧的中年人。这位不愿让记者披露单位和姓名的中年人，是西安市某县的一名山乡民办教师。两年前，这位教师的母亲和妻子双双患病，而他又半年没拿上工资，在此情况下，是走还是留？不走可以保住这所学校（因为这所学校只有他这 1 名教师），可以保住山里的这 20 多名孩子不失学，但目前的家境，已把他推入难以自拔的生活低谷。走，可以出山，回到山外的小村庄，侍奉母亲和妻儿。但，他放心不下这里的 20 多名山里娃，只要一合眼，那 20 多名山里娃的小脸蛋就在眼前晃动。几天前，山里曾传出他要走的消息，一时间，那 20 多名山里娃围住了他栖居的那间小泥屋，他们哭啊，哭得嗓子哑了，哭得泪水打湿了衣襟……这真是一种难割舍的抉择啊。在万般无奈之后，他想起了来辉武教授。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给来辉武教授写去一封信，诉说母亲和妻子的病情，又诉说了自己的境况，那意思再明显不过，是想请来辉武教授赠送他几个 505 产品，解除母亲和妻子的病痛。谁知，他作梦也没想到的是，在信发出去一个星期之后，来辉武教授进山了，到那所简直难以同“学校”这个字眼联系的学校来了。在他栖居的那间小屋，来辉武教授拧眉静听他的诉说。临别，他将 5000 元钱递到那位教师的手中，说：“我敬重您，敬重所有从事教育事业的人，没有你们，绝不会有陕西经济的腾飞，祖国的昌盛。这 5000 元钱，你先贴补家用，你要的 505 产品，已派人送到你家中……从今天起，你就是 505 集团的一名编外员工，我每月工资的一半归你，作你的工资，希望你能为山沟沟里培养出几名大学生！”两年过去了，这位教师的母亲、妻子的病，早已被 505 神功气袋治愈；他的那所学校，也旧貌换新颜：校舍重新翻盖了，学校建起了图书室、篮球场，这些都是来辉武教授与那个县的有关部门一起出资完成的。据说，为这些，来辉武教授在一次社交活动中还针对那个县的领导说：“你进山去看看那个小学，破烂成那个样子，你难道一点也不心痛？”如今，这位教师仍是 505 集团的编外员工。每隔三、两个月，他都要往 505 集团总部走一趟，向来辉武教授汇报一下孩子们的学习情况。也怪，几乎每天一开门就被各种来人所包围的来辉武，对这位“编外”员工特别照顾，只要他来，总要挤出那么一点时间，哪怕是 10 分钟，同他谈谈山里的孩子，谈谈教育上的事情。

据知情人士透露，像这位民办教师一样的“编外”员工，在 505 集团不计其数。

来辉武教授捐助兴建了 10 所希望小学。

陕西山阳袁家沟乡是革命老区，山大沟深，自然条件差，经济比较落后。袁家沟乡有个叫阮班柱的校长，搞了大半辈子的教育工作，一心想在乡里建一所希望小学，让乡里所有的娃娃们都能上学读书。他八方筹措，无奈仍有 8 万元的建校资金缺口迟迟不能落实。看着娃娃们一双双求知的双眼，阮校

长心里急啊，加上他常年劳累，积劳成疾一下住进了医院。一个偶然的机，来辉武见到了这位校长，听完他的讲述，来辉武感动地说：“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知道农村孩子受教育难，你们袁家沟乡有您这样任劳任怨的好校长，好教师，是你们全乡孩子的骄傲。”他立即指示工作人员尽快将8万元送到袁家沟乡希望小学，阮校长感激得落下了泪。

当第二次阮校长拖着久病初愈的身子，带着希望小学的照片，见到来辉武教授时，来辉武从阮校长欣慰的目光里，似乎看到了孩子们可爱的笑脸。

有次来辉武正在西安开会，一位曾相识的老教师来电告急。这位老教师饱经风霜，即将退休，小孩又患有重病，无钱医治，于是想起请来辉武帮忙。来辉武连夜寻找这位老教师的住处，找了近5个小时，终于找到了，送了近万元。

河南省社旗县桥头村有个叫张继山的青年，出生刚3天，父亲就去世了。十几年间，他长期与牛为伴——白天观察牛的拉犁，吃草和哺乳，晚上品味牛的起卧和拉撒，终于练就一手画牛的绝活。1992年，他从安阳师专美术系毕业，当了两年中学教师，突然又接到中央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惊喜之余，他又惶惶然。这每年3000元的学费，对家境正常的人来讲，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何况他这样一位几乎被生活纤绳压弯了腰的青年。到中国最高美术学院深造的诱惑使他欲罢不忍，几乎在绝望中，他想起了被人誉称为“红色慈善家”的来辉武，他决定向来辉武教授求助。于是一封求助信，连同中央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寄出了。10天后，一张3000元的汇款单，由陕西咸阳飞到了这位河南小伙子的手上。

终于，张继山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学习，仍在画牛。他准备在1997年牛年到来之际，举办个人的“牛”画展。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画研究院院长刘勃舒教授称赞张继山“笔墨运气十足，大有发展前途”，而张继山这样回答：一想起来辉武教授，我对牛的品格和精神的理解，就有一种新的升华。这品格的精神，浓缩成4个字，就是“无私奉献”……

在陕西，还流传着小李欢的故事。

今年13岁的小李欢，是西安市解家村小学的学生。4岁那年，这位天真烂漫的小女孩不知怎么患上一种叫作“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的顽症，全身无力，下肢瘫痪。为给孩子治病，小李欢的父母花光了积蓄，跑遍了全国的大医院，都没有使孩子的病情有丝毫的好转。小李欢是个顽强聪明的孩子，虽然病魔缠身，可每次考试总是年级前3名。1993春天，来辉武教授得知了李欢身患不治之症，家庭十分困难的情况，立即派工作人员赶到李欢家中探视。正在这时，美国迪斯尼儿童度假村要为世界各国患绝症的儿童举办“给孩子一个世界”的人道主义活动，小李欢被选中了。李欢的父母是多么想在孩子的记忆中留下一片美好的世界啊！但是，为给孩子治病，他们不仅花光了积蓄，还欠下累累债务，哪还有钱送孩子去美国呢？来辉武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刻约见小李欢的妈妈，讲了3点意见，一，为了孩子，这个费用我们包了，我们捐赠5万元；二，钱一定要用在孩子身上；三，孩子的根在祖国，要相信祖国的传统医学能治好孩子的病，让孩子好好学习。

1993年3月3日，小李欢和他的父母飞赴美国。正在北京的来辉武教授专门打回长途电话，嘱咐助手代自己到机场为小李欢一家送行，并再三叮嘱：“在孩子面前，绝不能提‘绝症’的字眼，免得孩子受不了。”

小李欢见到来辉武伯伯是在一年后的一次联欢会上。那天，厂里的职工

正在联欢，小李欢在父母的陪同下来了，她是来向来伯伯致谢的。在联欢会现场，当坐在轮椅上的小李欢看到来辉武教授的一霎那间，一句“来伯伯你好”的问候尚未脱口，便一下子扑到来辉武的身上大哭起来。记者发现，小李欢的父母和来辉武教授，还有满场的宾客，也哭了。

来辉武教授钟情教育，支持教育的故事有多少，连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说不清。他们能说清的，是这位名扬海内外的企业家对教育的执着和慷慨，热切和忠诚。他们说，来辉武教授是在用自己的一颗心，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呐喊、呼号！

书记情系山里娃

一个普普通通的山里娃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命运竟会和一位地委委员、市委书记的心紧紧地系在一起。

山里娃名叫何海斌，居住在山西运城市稷王山下的上王乡，他在上王乡中学读书，年仅12岁。然而，就这样一个孩子，父亲患有精神病，接着母亲又狠心地抛下了他和他，弃家出走，去向不明了。小海斌失去了母爱，而对于精神病的父亲，他不仅得不到爱，还要照顾父亲。他过早地承担起家务，生活十分的艰辛。

1996年12月17日，上晚自习的时候，小海斌突然腹痛难忍。校长和老师急忙把他送到了医院，并凑钱办了入院手续。经过医生仔细检查，小海斌得的是胃穿孔。医生说：“幸亏及时送来了，不然就有生命危险。”两位就诊的大夫知道了护送小海斌到医院的是老师和校长时，深受感动，当场掏出200元钱说：“我们一定尽全力抢救孩子，一心一意把孩子护理好。”

第二天一大早，地委委员、市委书记听说了这件事后，专程赶到医院询问小海斌的病情。当他了解到小海斌的家庭情况，小海斌是怎样挑起了家中的重担时，眼眶湿润了。他对学校的老师和医院的医生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小海斌我一定要当亲孙子看待，他上学的费用，生活的费用我们要管好，要让这个无依无靠的孩子体会到党的温暖。”说完后，他掏出500元钱，留下了一大包营养品。他又为小海斌按了按被角，坐在床边，摸着小海斌的额头亲切地说：“孩子，你安心养病吧。有党在，就一定有真情在，山里娃有志气，等病好后，你一定能发奋读书，早日赶上队。”

小海斌感动得流出了泪花，两只小手握着书记的大手久久不放开，嘴里不住地说：“书记爷爷，你真好！我不会忘记您的恩、党的情，一定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爷俩说得那么投机，处得那么亲近，此情此景使在场的人心热了，眼睛湿了……

市委书记情系山里娃的事，像山里的葡萄一串一串的；1995年，他去柏王山脚下的三路里镇，千方百计地和那里的干部群众动员了50名失学儿童入了学；1996年，他三去中条山中的五龙岭乡刘家坡小学，那里的校舍是破旧的土窑洞，20名小学生随时都有流失的危险。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积极兴教扶贫的运城地区血研所，血研所的同志们一下子就捐了3万多元，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去年年底，学校落成时，书记又和血研所所长一起为那里的孩子赠送了图书、文具、衣服，还和孩子们一起照了像。

“希望工程”真的开了花

1996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向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捐资希望书库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自本年4月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动员全行业50万名职工向贫困地区乡村小学捐建希望书库，共筹集捐款240万元，可捐建800个希望书库，成为希望书库推出以来系统发动职工捐款额最大的一家。

国家烟草专卖局一直热心希望工程，支持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此前，烟草行业的企业和职工多次捐款，已捐建希望小学58所，资助失学儿童7万多名。支持捐赠希望书库是中国烟草专卖局职工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奉献爱心的又一举措，该系统通过这一活动，对员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效地增强了员工的社会责任感。

在捐赠仪式上，由沈阳卷烟厂捐建的康平县万圣希望小学的教师和学生代表，接受了希望书库的首批赠书。预计全部图书将于今年年底前送至1万所乡村小学的孩子们手中。

1996年“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北京市房山蒲洼乡的孩子们迎来了一个真正的节日——新校舍的奠基典礼。

蒲洼乡位于北京西南部的深山区，海拔高在400—1800米之间，是北京市的37个贫困乡之一，素有“北京的小西藏”之称。由于受地理环境，生活基础设施等条件的制约，蒲洼乡的教学条件、教育环境和教学质量与城镇小学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得知这一消息后，采取个人集资的办法，筹集捐助资金20万元，用于蒲洼平安中心小学的建设。

“新校”的建筑面积将达1608平方米，总投资为120万元人民币。

中国文化扶贫委员会主任徐惟诚同志参加了奠基仪式，同时中国大百科全书小百科全书编辑部向该校捐赠了百余册小学生书籍。

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于1996年3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捐赠仪式，第二次向希望工程捐资300万元人民币，用以支持其援建的希望小学进行后续建设。

摩托罗拉公司于1994年曾捐资300万元人民币，在全国10个省、自治区兴建了16所希望小学，其中西藏6所，新疆1所。此次捐资之举被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鹏称为是迄今为止，首家由捐助方面再次捐资原捐建小学的案例，在希望工程的发展中还是第一次，对巩固和扩大希望工程的成果具有重要意义。该公司表示，今后每年将捐资为希望小学培训师资，探索科、教结合的经验，并致力于帮助援建学校发展校园经济。

1996年5月28日，大同希望学校这所全国希望工程中唯一的孤儿学校的300余名学生，穿着崭新的校服，与大同车站派出所的干警叔叔们一起欢度属于他们的节日。

大同希望学校是大同市型煤厂在有关单位的支持和帮助下，于1993年11月创建的一所学校，专门招收“希望工程”救助范围内失去父母的孤儿，也有1.5%左右是因父母被判刑无人照管的孩子。如今，这所学校已有来自全国14个省市，汉、回、蒙、土、壮等13个民族的338名学生。他们中最小的6岁，最大的15岁。

大同车站派出所曾被评为全国廉政爱民优秀公安基层单位和全国公安系统学雷锋先进集体，他们在今年2月与希望学校结成警民共建单位，全所56

名干警十分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在“严打”斗争中，该派出所堵卡查缉成绩突出，受到了上级机关的奖励。“六·一”节前，他们用这笔奖金给每位孩子买了礼物。学校师生在联欢会上向公安干警们回赠了一块“铁道卫士，情系孤儿”的镜匾，表示对于警们的感谢之情。孩子演出了小品、歌舞等，干警与孩子们手拉手高唱“社会主义好”，将联欢会推向了高潮。

架设爱的桥梁铸造共同的信念 ——全国少儿“手拉手”活动红红火火

以救助失学少年为宗旨的“希望工程”举世瞩目，影响遍及海内外。如今，又一项新的“希望工程”——“手拉手”活动逐渐在全国展开，“伸出你的手，伸出我的手，让我们手拉手做朋友”，已成为千千万万少年儿童的自觉行为。

“手拉手”活动始于1990年，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国少年报联合发起，口号是“全国城乡小伙伴手拉手，共同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这一活动，在全体少年儿童中及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

京、津、沪等大城市的小朋友们率先行动，赶赴革命老区体验生活，并发表了社会调查《来自大别山的报告》。老区的经济社会状况，深深地打动了许多城市孩子的心，老区小朋友们的生活学习环境引起了他们深切的关注。

上海红领巾理事会发起“一本书寄友情”活动，仅一个多月，全市100万少先队员就为全国贫困地区小伙伴寄书200多万本。

北京市朝阳区12名小记者从贵州采访归来，把他们拍摄的六盘水地区的照片在各校巡回展出，拨动了全区16万少年儿童的心弦。大家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在短短几天，捐出10多万元，为边远山区的失学少年送去一片关心和爱意。

此后，福建三明市、河北石家庄等许多中小城市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

在这项活动中，城市小朋友们以各种形式，表达了自己的爱心，捐出节省下的衣物、书籍、文具等，为贫穷边远地区一部分小朋友缓解了生活学习困难。北京156中的同学们发起“献爱心”活动，短短3天，全校师生共捐出衣裤1722件，文具近2000件，在堆积如山的衣物中，有全新的毛衣，有八成新的呢子衣裤等。一位同学的信写得尤其感人：“这件棉坎肩是我的奶奶一针一线缝制的，它虽然不如买的好看，但它倾注了我们全家人的爱，希望它能带给你们温暖。”

在“手拉手”活动中，城乡小朋友们在相互交往中建立了友谊。还有的学校开展“友谊班级”活动，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和感情。有的山区孩子上学每天得步行几十里，冬天只穿一、二件冬衣，光着脚穿鞋。尽管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可是他们仍刻苦努力，勤奋学习。这些，都给城市的孩子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从中受到深深的教育。于是，双方互赠照片、贺卡，在精神上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争当好学上进的好少年。

“手拉手”活动，不仅沟通了孩子们的心灵，同时也缩短了城市和农村的距离。许多小朋友通过书信、夏令营活动等认识了对方，了解了国情，认识了社会。通过这些活动，不少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好像一下子变得成熟了，他们不再大手大脚地花钱了，过去上下课围着校门口小食摊争相购买的现象不多见了，因为他们想着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位伙伴，一位好兄弟，好姐妹，仍生活在艰苦的环境里……

这一活动影响面之广，冲击力之大，是始料未及的。许多小朋友主动参与，并倾注了满腔热情。他们从关心别人中，学会了交友，学会了处事，体会到了助人的快乐。

许多城市的中小学校，还利用本校拥有较强的师资水平和教学实力，主

动和老少边穷地区的学校“结对子”，通过介绍办学经验，培训师资，寄赠教学资料等，为老少边穷地区的教育事业作贡献。北京市从1991年开始，全市40所中学与全国10个边远省的中小学挂钩，开展教育双向交流活动。汇文中学接受贵州地区有关学校3年师资培训计划，同时还决定派教师到该地区讲课，并作为一种制度巩固下来；北京35中为对方寄赠图书上千册；翠微中学挤出经费支持对方办学；育才中学先后两次接待锡林勒盟镶黄旗一中的教师。同时，北京的一些学校也到所联系的学校进行学习交流，双方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和牢固的关系。

进入新的一年，“手拉手”活动又有新的进展，由全国少工委等5家单位联合组织，“手拉手”活动将扩大到100万对，小朋友们除了通信交流思想外，还将倡导开展寄一本好书，一份好报纸或一件文具等活动；中国少年报还开展征文活动，评选出记述参加这一活动感想的好文章；“六·一”前夕，将在全国选拔出100对思想品质好、学习进步大的少年儿童进京，参加“手拉手”好朋友相会在北京”表彰活动……

对于这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活动，各有关部门非常支持，大开绿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多次关心、询问活动的进展情况并给予具体指导。国家教委有关部门表示要积极配合，进一步搞好这一活动。可以预见，在新的一年里，“手拉手”活动将更加红火，小朋友之间的友谊将更加深厚

昔时百姓送亲人当红军 今日官兵倾爱心于希望

1997年“六·一”前，又一所在军队将士们的关心下，援资30万元，占地9.3亩，开设7个班，可容纳1200多名学生的“八一希望小学”，在樟树市吴家巷破土动工。至此，在江西省半部老区，由军队拨款修建的希望小学已达到7所。

江西是我军的发祥地和中国红色政权的摇篮，“八一”起义在南昌、革命摇篮是井冈山、红色故都在瑞金……当年，800万井冈山儿女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突出的贡献。据统计，在这块红土地上，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24.7万之多，无名烈士更是不计其数，那“儿童团”帮助红军打狗子的故事至今流传。如今，国家富裕了，军队强大了，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块红土地，军队的子弟兵们更没有忘记他们，尤其没有忘记这里的孩子们。1995年我军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捐款25万元，在万宝县宝山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几年来，国防大学的179名将军先后来到此校，为孩子们献上一片爱心，不时地为他们送来了微机、电视、书籍、小霸王学习机等。如今，这所小学已有200多名学生以优异成绩毕业。由南京军区投资65万元援建并由政委方祖岐书写校名的“三湾希望小学”，原来只有一栋三层楼的危房，500多名学生有近300人分散在老百姓家中读书；如今，这里的危房改造已全部完工，新建的四层的教学楼、二层的师生宿舍、门楼围墙也即将完工，并配有微机房、文件活动室，装备有微机、彩电、影碟机、录像机、照相机、乒乓球、台球等，近300名学生已逐步返回学校。此外，江西省军区在宁冈县穆村乡，上海警备区在遂川县共为老区的希望小学捐款数万元，捐书2000多册，为老区的儿童奉献了一片诚挚的爱心。

军队的单位如此，我军官兵个人（含离退休老干部）对老区儿童更是一片浓浓情意。总后勤部原副政委李真将军，在1995年，将他珍藏多年的名贵字画在北京拍卖，将所得65万元巨款全部捐献出来，在永新县禾川镇修建了一所集教学、教研、实验于一体的学校，一下可接受720名学生在此学习；原昆明军区政委谢振华一次给崇义县上堡方甲子小学捐款10万元，驻厦门部队的一位首长，为兴国县一所小学一次捐款13万元，可至今大家仍不知他的姓名。其他普通官兵也通过不同方式捐款捐物。据统计，我军官兵的个人捐款总额达208万元。在“1+1”工程活动中（即一人帮助一名失学儿童上学），40多名老红军和65名新老将军纷纷行动，仅仅他们资助重返校园的失学儿童就达121人。老将军舒行一人同时资助4名学生上学，并捐款2.5万元到吉安长扩镇济南小学改善教学设备；老将军赖传珠从1989年开始，资助井冈山市下七方小姑娘肖玲读书，从小学供到她读大学，可7年多来，老将军却一直未见过小姑娘的面。

笔者在采访中，反复提出一个问题：大家为何如此钟情老区儿童、无私奉献，他们的主要思想和动机是这么一致；江西老区人民为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的牺牲，饮水思源，今天，我们也要为老区人民，特别是老区人民的后代尽自己一份爱心，托起他们明天的希望。

情系失学的孩子

——邯郸市财政局长张顺孔救助贫困失学学生纪实

1997年8月7日，对于河北省涉县神头村的李志强和椿树岭村的王晓丽，是终生难忘的一天，因为这天他们得到了邯郸市财政局长张顺孔的资助，重圆了“我要读书”那金色的梦。

那天，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张顺孔踏着农村小路走进了李志强的家。两间又黑又暗的破旧小屋里，支着两张床铺，住着祖孙4口人。9岁的李志强，5年前父亲死于车祸，随后母亲改嫁，他和年逾古稀的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年纪尚小的哥哥相依为命，生活极其艰难，小志强上学成了这个破碎家庭难以承受的负担。

拿着张局长带来的书包、文具、字典、小学生参考书及衣服、鞋袜，小志强的泪珠扑簌簌掉下来。张局长掏出一个信封交给志强的爷爷，说：“这是给孩子这个学期的费用，共500元。”老汉用颤抖的双手接过来：“500元哩，俺太感谢局长了……”

张局长说：“一定要孩子好好上学，不能辍学，家庭生活再困难，也要设法让孩子上学，只有好好培养，孩子长大了才有出息。”他抚摸着志强的头说：“一定要勤奋学习，学出拔尖的成绩。”小志强表示：“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张爷爷的好孩子。”

离开神头村，车沿着蜿蜒的小路来到了椿树岭村，冒雨等候在村头的王晓丽快步迎上来。拉起她的手，张局长微笑着说：“你给爷爷写的信收到了，等急了吧？自得知你因家庭困难而面临失学，我心里就惦念得很，尽管工作很忙，我也一定会来看你的。”

16岁的晓丽即将上初三，家中只有母亲和3个妹妹。上初二时，母亲因凑不够学费和书费，哽咽着对她说：“还是退学吧，不是娘不让你上，靠娘一个人支撑这个家，实在太难了！”晓丽哭着说：“娘，我会干好活的，哪怕隔一天去一次学校，我决不退学！”母亲没话说，晓丽明白母亲的难处，不再为难母亲。

辍学在家的她，唯一的慰藉和鼓励是墙上那标志昔日她品学兼优的一张奖状。等全家人睡着了，劳累了一天的她，才开始自学。看着女儿疲惫的面容和非要读书不可的犟劲，母亲不知多少次偷偷流下眼泪。被晓丽求知若渴的精神所感动的邻居们，自发地伸出援助之手，集凑了学费和书费，使她重返了课堂。

晓丽的家事深深触动了张局长，他决心救助这个不幸的孩子。他对晓丽说：“穿一下鞋和衣服，看合适不？爷爷另外再给你500元学费，还有一袋大米。等到下学期，我还来看你。”接着，又对晓丽的母亲说：“让孩子好好上学，初中读完上高中，高中上完上大学，任何一种学校，只要她好好学习，能够考上，我就会一直供她。”

张局长深情地说：“我也是山里人，小时候的生活艰辛和读书不易，使我始终惦记着山里的孩子，尤其牵挂着濒临失学的学生。好好学习啊，孩子。”早已泣不成声的晓丽向张爷爷表态：“我今后一定要努力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来报答您。”“那就好，那就好。”张局长满意地笑了。

张局长就要离开了，晓丽和母亲及乡亲们一直送到村口，在雨中目送张局长远去……

